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ARXISM AND FORM

Fredric Jameson 著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ARXISM AND FORM

Fredric Jameson 著

张定维 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 (美) 詹姆逊 (Jameson, F.) 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西方文论丛书)

ISBN 978-7-5446-1368-2

I. 马… II. 詹… III. 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理论—英文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7380号

图字: 09-2006-768号

©197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is special edition is for sale in Chinese mainland only. Sales outside Chinese mainland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本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a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ap.com.cn> <http://www.sflap.com>

责任编辑: 苗 杨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9 字数 452千字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368-2 / B · 0000

定 价: 5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西方文论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陆建德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常耀信

郭继德

黄源深

蒋洪新

李公昭

李维屏

林骧华

刘海平

申 丹

盛 宁

石 坚

史志康

王守仁

杨仁敬

殷企平

虞建华

张 冲

张定铨

朱 刚

庄智象

出 版 说 明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多数高校英语专业都开设了西方文论课程,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市场上,有关西方文论的图书往往都以译介类的为主,缺少原汁原味的引进图书。为了使读者能亲近西方文论的原版著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邀请国内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出书单,从国外出版社引进了一批西方文论方面的专著,以满足广大师生的教学与科研需求。鉴于西方文论重理论、强调逻辑推理和阐述论证,原文理解难度较高的特点,出版社还邀请了专家为每本著作撰写了简洁精辟的导读,希望能在内容上拉近原著和读者的距离。

西方文论源远流长,精彩深邃;自20世纪以来,其发展更是异彩纷呈。丛书在策划和筛选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会所有专家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限于经验和专业水平,我们的工作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还望各位专家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近 10 年，国内一些出版社经授权直接印行外版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著作，并以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标价，受到大学师生和研究者由衷的欢迎。在这些图书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剑桥大学出版社引进的“剑桥文学指南丛书”尤其成功，它们大大推进了我国英语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20 世纪下半叶是众多文学理论各领风骚的 50 年，文学研究的面貌大大改观，理论家和批评家取得了与诗人、作家几乎平起平坐的地位。正是各种文论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一直处于一种天真的状态，对主导批评活动的或明或暗的方法、预设和前提不加追问。上世纪 70、80 年代开始，欧美大学文学系对理论课程的需求迅速增长，一些文论选本和文论导读、入门也应运而生，有的还被译成了中文，在大学师生中很受欢迎。这些辅助性的指南固然有其用处，但是要了解文论的精髓，我们还是应该暂时把二手译作放在一边，回到原著。

在一些学者的大力推荐下，外教社决定再推出“西方文论丛书”，首批五种。这些著作堪称文学与哲学研究的经典，其影响不必由我在此赘述。首批文库中有的已出中文译本，不过对于能阅读英语原版的读者而

言，翻译毕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如能直接亲近原文，当然最好。现在各大学哲学系和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师生，英文水平也很高，相信他们也是文库的忠实读者。

我还想乘机强调，对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师生而言，阅读批评理论著作必须与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相结合。现在有一种戏说理论的空疏文风，一些概念、术语就象投资市场上急速膨胀的热股一样受到追捧，炒作者似乎有一种大权在握、独领风骚的美妙感觉。泡沫一旦破裂，受损害最大的还是广大学生。奥尔巴赫和弗莱等批评大师从来没有把理论当成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或争夺话语霸权的场所，他们的理论发挥总是伴随着作品细读以及由此体现的智慧与敏感。记得前几年一度被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米勒教授（J. Hillis Miller）来华讲学时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本牛津蓝皮袖珍版特罗洛普小说轻轻摩挲，听众深为他对文学的挚爱而感动。我们不妨通过这些大师来认识理论与文学阅读相辅相成的各种可能性。

陆建德

近 30 年来，中国学术界发生了两件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其一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将一些在西方有影响的理论书籍译介到中国内地，内容主要涉及哲学、语言学以及文学批评；其二是，大约在上个世纪末，各大出版社开始用购买版权的方法，直接将这类书籍引入中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这一微妙的变化可以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语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具有直接阅读原著能力的阅读群体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各大出版社都在争先恐后地开辟这个市场。这种竞争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后果，如重复引进，造成浪费；但是，总体来说，这对广大知识分子是件好事。

国内做学问最大的困难是资料匮乏，公共借书渠道不畅。形象地说，国内做学问往往得“看菜做饭”，确立研究课题前得考虑图书馆中有什么藏书，而国内大多数图书馆的外语藏书少得可怜。每每听到学生抱怨参考书难寻，导师们只得无助地苦笑。毕竟，导师的藏书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引进一些书籍，可以略微缓解眼前参考书籍难觅的困境。引进原版参考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即减轻学生和学者的经济负担。直接购买原版书，手续复杂，周期漫长，且书费昂贵。尽管西方人收入较国人普遍高些，但是他们在购买专业用书时也是精打细算的。记得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大学中设有二手书专卖柜台，按书的新旧打折，不少学生都喜欢买便宜的旧教科书，省几个钱。引进的原版书

开价也不算便宜，如研究女性文学的必读书《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在国内售价 32.9 元，但是在美国售价为 23.7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80 元。相比之下，引进的原版书售价便宜多了。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此次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一书已在先前由李自修先生全文译出，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¹。但是，只读译本是不够的。随着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读原著。原因很简单，再好的翻译也不可能将原作品的意义确切转述出来。对于有一定外语水平的读者来说，读原著往往比读译著更容易些、明白些。另外，现在不少论文是用英文写作的，故引用他人话语时必须用英语，光读翻译作品已经不能满足学术论文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经典学术专著。该书的作者是中国学者熟识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下公认的两位最有声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另一位是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詹姆逊 1934 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担任助教，在之后的 50 年中，虽然换了几个学校，但一直没有离开大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部专著中。第一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 年发表；第二部是《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1981 年发表；第三部是《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 年发表。从时间跨度上看，是十年一部。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确立了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领域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由于该书的问世，长期被美国人遗忘了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美国重振雄风。该书研讨的主题——模式和历史的关系、理论和文本的关系——在《政治无意识》中有新的诠释。詹姆逊借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术语，并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政治在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时是无法回避的。该书以其鲜明的立场让读者感到耳目一新。詹姆逊声称从政治视角对文本进行解读具有其它批评视角所没

1 笔者在读原著时，也仔细地阅读了李自修先生的译著，本文的引语均来自该书，在此致谢。

有的“优越性²”，“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³”。那么，这种具有浓郁政治倾向的“永远历史化”的阐释模式在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后是否具有生命力？《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坚持文化与经济和政治无法分割、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联系的观点，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理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独特论断。显然，詹姆逊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较之其它理论更具优越性。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辩证思维方式，要理解詹姆逊众多著述中有点纷乱及繁杂的思想的关键是理解他如何运用辩证法分析各种文化现象、文学作品与社会及历史的内在联系。辩证法反对孤立地观察事物，认为世间万物都以一定的形式相互关联，因此，用静止的、单一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不可能深刻地揭示文本的含义。无疑，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反对对文本进行“纯美学性”的阐释。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或文化形态的产生都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而这种联系往往不容易为人察觉，或者说，往往被表象所遮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使命就是努力用辩证的分析方法去说明这种隐藏在表象后面的、深层次的种种联系。这一思想是贯穿詹姆逊三部主要专著的一条主线。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的批评方法在后两部作品中得到了延伸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是美国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如此评价此书毫不为过。让我们回顾一下该书的出版背景。20世纪50年代政治保守主义主导美国。斯大林政权对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使美国民众，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共产主义远景在他们心中所唤起的几分希望彻底破灭，人们“开始把五十年代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激进运动的陈旧政治观点已经失掉了活力，它再也无法在知识分子中唤起忠诚或热情了⁴。”从30年代开始，美国思

2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成熟的批评方法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在审视作品与社会及历史的关系时有宽广的批评视野，表现出其他批评方法无法企及的优越性。但是，新批评的“近距离阅读”方法，在对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分析方面则表现出自己的迷人之处。

3 见《政治无意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8页。

4 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第88页。

想界完全由经验主义把持，轻理论，重实践之风盛行。在文学批评领域则表现为“新批评”成了美国最主要的批评模式。

“新批评”声称文学作品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文本之外的一切因素与文本的意义无任何直接关联。一件文学作品，小到一首诗，大到一部小说，都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自我完整的独立实体；它有自己的结构，有一个特定的形式，由一系列复杂的形式要素构成。一个批评家的责任就是仔细分析不同形式要素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挤压，并进一步观察它们如何得以缓解，从而产生和谐，进而生成意义。“新批评”认为文本之外的因素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并无直接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新批评”对意义源自于作者的看法嗤之以鼻，称之为“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因为谁也无法知晓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或者说，连作者本人也不能确凿地知道自己的创作意图。可见，“新批评”基本排斥文本之外的内容介入意义的阐释过程；基本忽略历史、社会、读者在文本解读中起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是对盛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和以形式为上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最大挑战。正如詹姆逊所言：辩证法是对经验主义实在论的一种威胁。经验主义将“现实分割成一些封闭的空间”、“把政治同经济，法律同政治、社会学同历史等因素割裂开来，因此，人们永远无法了解任何问题的全貌⁵”。“新批评”的致命弱点就是无视文本意义的社会性及政治性。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共五章，基本上是数个不同时期发表的单篇论文的合成品，因此，章与章之间的过渡有点跳跃，整部书读来不够顺畅。第一章，“T·W·阿多诺，或历史的转义”，发表于1967年；第二章，“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变体”，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讨论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另外三个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马尔库塞、以及恩斯特·布洛赫。第一部分，“瓦尔特·本雅明，或怀旧”，最初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1969年；第三章，“关于格奥尔格·卢卡契”，发表于1970年；第四章，“萨特和历史”，是詹姆逊博士论文的延伸；第五章，“走向辩证批评”，是在其1971年初发表的单篇论文“元批评”(“Metacommentary”)的基础上写就的。

尽管《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也有一些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精细入微的分析，但是，总体上，它的立足点是“居高临下”的；它以宏观的批评

5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311-312页。

视野讨论文艺形式与历史的关联。詹姆逊对阿多诺音乐理论的评述向读者展示辩证法如何巧妙却又雄辩地把文艺形式放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由于西方音乐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历史的，由于它的发展如此强烈地依赖我们自己文化的历史和发展，因此它不是永驻的，它内部包含着作为一种真正活动的死亡，当它到达了自己的目的，或当它一度满足的那种社会需求不复存在时，它就会消失⁶。”根据这一逻辑，上个世纪初期流行于维也纳的“无调性”音乐可以被视为一种“狂暴地摆脱和谐的约束”的努力，是“西方中产阶级社会内自主主体的解体，是我思故我在或者自我制约意识的解体”的表征⁷。但是，不管“无调性”音乐与当时的主流音乐相比显得多么不理性，“它在自身内部同时也带有新控制的某些因素，”“因为不管趋向完全自由的意志怎样，无调性作曲者仍然在一个僵滞的调性世界里工作，对于过去必须小心谨慎⁸。”因此，任何文学、艺术形式，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无调性”音乐作品也好，在它的表现形式后面，总有一种促使其形成的历史因素存在。

詹姆逊在第二章中点评了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三人的辩证思想和批评方法，实际上也是向美国读者介绍他们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如何在他们的阐释中得以演绎；同时，詹姆逊也对他们做出批评。本雅明是一个竭力从各种矛盾的冲突中找到一种和谐出路的思想家，他的身份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是一位文学家，哲学家；他同时信仰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神秘主义哲学。他有关艺术品复制的论述既是对商品社会中艺术沦落成商品的批评，也是对科学技术有益于艺术创作与人类文化发展的辩护。“本雅明的著作仿佛镌刻着一种痛苦的勉强，他力图获得某种心灵的整体性或经验的统一性，而历史境况却处处都有可能把这种整体性或统一性粉碎⁹。”

在所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中卢卡契对詹姆逊的影响或许是最大的。尽管在西方有不少人对卢卡契表示失望，认为他的理论有过于政治化的倾向，但是詹姆逊坚持为他辩护，要求人们全面地看待他的一生，提出卢卡契不同时期所阐发的文学理论是一个整体，是他对同一系列诸多复杂问题渐进的探索和拓展。他对卢卡契的《小说理论》

6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9-10页。

7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21页。

8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22页。

9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49页。

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作品坚持将“社会自身看作是个体生存的具体性或抽象性的终极源泉¹⁰”的立场，第一次试图将近代小说艺术的产生、发展与社会历史的演变放在一起进行系统的考察。卢卡契对小说特性的分析至今令人叫绝；对此，詹姆逊有精彩的陈述：“小说不再像悲剧或史诗，不再是一种具有内在常规的封闭的既定的形式；相反就其结构本身来说它颇不确定，是一种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必须重新进行创造的混杂形式。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过程，其中每一种叙事的可能性都必须从无开始，没有任何既成习惯的力量[可以借助]：它的特殊题材因此将是在一个目标和路线均未确定的世界上的寻觅¹¹”。另外，詹姆逊的“总体化”批评方法显然受到卢卡契的影响；他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历史主体意识理论”十分赞赏，因为卢卡契使“抽象哲学问题复归于它在社会现实自身中的具体境况。并提出了认识论层面上的普遍性和个别思想家本身的阶级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¹²”。纵观詹姆逊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他的理论始终在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框架中运作。

萨特对詹姆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詹姆逊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在第四章中，詹姆逊批评了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思维逻辑。人们普遍认为萨特的早期作品《存在与虚无》集中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它以个人的活动和选择为出发点去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而他的后期作品《辩证理性批判》则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它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思考人的存在问题。詹姆逊提出不要把萨特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割裂开来，《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思想是《存在与虚无》中所阐释的思想的延续，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根本决裂”的关系。詹姆逊以其典型的、“不停跨越”的批评方式对《辩证理性批判》进行评述，并时时将萨特其他的著作（哲学的以及文学的）纳入他的批评视野之中。

在第五章中，詹姆逊对辩证批评方法以及辩证思维的重要特征作了简要的总结。辩证法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突破任何习惯性的日常思维方式的限制，它可以包容在常理看来相互矛盾的事物。詹姆逊指出，简言之，辩证法关注的是“事物不断地由否定到肯定、由肯定到否定的转换

10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140页。

11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146页。

12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156页。

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历时性过程¹³”。据此，辩证批评反对以某些固定的模式来解释作品内容的含义，因为每部作品的内容的发展都遵循一种“内在逻辑”：“作品演化出它自己的范畴，并规定对它自身释义的特殊用语”；任何概念，不管它多么抽象，不可能独立于历史之外而具备意义。例如，文体学这个看似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努力“扬弃那种环绕拉丁和希腊文本而建立的古典教育体系所带来的结果¹⁴”。

詹姆逊提出辩证思维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思维方式。它在“思考一个特定客体”的同时，又观察这个“思维过程”本身。直白地说，这种“自我意识”就是一种自我否定的做法，就是不谋求简单地回答某个问题，而是透过表象去寻找“主-客体关系的起源”。例如，对于一个熟悉辩证批评的读者来说，他对一首晦涩诗歌的解读不会停留在寻求直接释义的层面上，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正是晦涩本身”，“正是晦涩的特殊性质和结构¹⁵”，正是形成这种晦涩的深层的历史原因。詹姆逊还提出辩证思维是“反体系”的。它的活力就在于永远努力将新的阐释方法纳入自己的思维体系，因此，它具有包容一切矛盾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已经问世38年。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不少新的发展。但是，我们惊奇地发现，辩证思维一直贯穿他此后发表的著述之中，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文化/文学现象的最有生命力的理论模式，这在他的《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著作中可以找到佐证。

林定铨

13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262页。

14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282页。

15 见《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288页。

**Il n'existe d'ouvert à la recherche mentale que deux voies,
en tout, où bifurque notre besoin, à savoir,
l'esthétique d'une part et aussi l'économie politique.**

—Mallarmé

**Intelligent idealism is closer to intelligent materialism
than is unintelligent materialism.**

—Lenin

PREFACE

WHEN THE American reader thinks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I imagine that it is still the atmosphere of the 1930's which comes to mind. The burning issues of those days—anti-Nazism, the Popular Fro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labor movement, the struggle between Stalin and Trotsky,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generated polemics which we may think back on with nostalgia but which no longer correspond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ld today. The criticism practiced then was of a relatively untheoretical, essentially didactic nature, destined more for use in the night school than in the graduate seminar, if I may put it that way; and has been relegated to the status of an intellectual and historical curiosity, as which, in the form of an occasional stray reprint of an essay by Plekhanov or a passing reference to Christopher Caudwell, it is presently maintaine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 different kind of Marxist criticism has begun to make its presence felt upon the English-language horizon. This is what may be called—as opposed to the Soviet tradition—a relatively Hegelian kind of Marxism, which for the German countries may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eoretical excitement of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1923, along with the rediscovery of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while in France it may be most conveniently dated from the Hegel revival there during the late thirties.

I would be well pleased if the chapters that follow were found useful a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at Marxism and to some of its principal theoreticians. I have in particular tried to give a full account of some of its key works—Lukács' *Theory of the Novel* as well as hi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Bloch's *Hope the Principle*, Benjamin's

PREFACE

Origins of German Tragedy, Adorno's *Philosophy of the New Music* and *Negative Dialectics*, Sartre's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which have been, at worst, inaccessible to the English-language reader and, at best, little discussed here.

Even such a relatively modest and straightforward task as this is, however, a whole program in itself: for one thing, even the better-known writers such as Sartre or Lukács have never come into focus clearly in English on account of the anti-Communist bias of their commentators, or often simply on account of the absence of any genuine Marxist culture in academic circles.

Less obvious, perhaps, is the degree to which anyone presenting German and French dialectical literature is forced—either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to take yet a third national tradition into account, I mean our own: that mixture of political liberalism, empiricism, and logical positivism which we know as Anglo-American philosophy and which is hostile at all points to the type of thinking outlined here. One cannot write for a reader formed in this tradition—one cannot even come to terms with one's own historical formation—without taking this influential conceptual opponent into account; and it is this, if you like, which makes up the tendentious part of my book, which gives it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utting edge, so to speak. For the bankruptcy of the liberal tradition is as plain on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as it is on the political: which does not mean that it has lost its prestige or ideological potency. On the contrary: the anti-speculative bias of that tradition, its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 fact or item at the expense of th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in which that item may be embedded, continue to encourage submission to what is by preventing its followers from making connections, and in particular from drawing the otherwise unavoidable conclusions on the political level. It is therefore time for those of us i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